

影響台灣民眾政治參與的因素： 從公民規範認知的觀點出發*

俞振華** 翁定暉***

摘要

為什麼民眾參與政治活動?本研究利用 2004 年及 2014 年兩波調查資料,探討公民規範認知(即民眾對於「好公民」的想法)如何影響政治參與,並進一步結合其他解釋途徑,分析這十年間民眾政治參與變遷的主因。首先,我們根據 Russell Dalton (2008; 2009) 的理論,將民眾的公民規範認知區分成兩個構面,包括義務規範認知(duty-based citizenship norms)及參與規範認知(engaged citizenship norms),並探討這兩個規範構面與政治參與行為的連結。我們的發現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1) 參與規範認知比較會影響個人積極性的政治參與;(2) 義務規範認知會影響個人的投票行為;(3) 這兩個構面都不會影響一個人是否成為政黨黨員。其次,本文將前述文化價值的分析途徑結合社會結構途徑及心理態度途徑,並利用這三個途徑所建

* 本研究接受行政院科技部補助「民眾的公民權認知與政治參與：一個跨國與跨時的分析」(計畫編號 105-2410-H-004-019),在此感謝。另外,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6 年「公民意識與多元價值」學術研討會(2016 年 5 月 26-27 日,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作者感謝黃信豪教授的評論,及期刊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及指正,惟文責由作者自負。

** 通訊作者。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暨政治學系副教授, E-mail: ericyu@nccu.edu.tw,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02-29383091 分機 50500。

***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政治系研究生, E-mail: ting-wei.weng@stonybrook.edu。

構的影響因素，分析2004年到2014年政治參與的變遷。我們發現：十年間積極性政治參與及政黨參與的改變，主要是因為影響機制產生結構性的變化；而投票參與的改變，主要取決於各個影響因素本身的變化。

關鍵詞：政治參與、公民規範認知、文化價值途徑、社會結構途徑、心理態度途徑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From A Viewpoint of Citizenship Norms

Eric Chen-hua Yu*, Ting-wei Weng**

ABSTRACT

Why do citizens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This study utilizes two waves of survey datasets in 2004 and 2014, respectively, and focuse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citizenship norms (i.e., perceptions of “good” citizenship) affec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combines different explanatory approaches and analyzes wh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changed over the ten-year period of time. By adopting Dalton’s (2008, 2009)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divides citizenship norms into two dimensions—namely, duty-based citizenship norms and engaged citizenship norms, our findings regarding the linkages between norm perceptions and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are threefold: first, the perception of engaged citizenship norms ma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c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econd, the perception of duty-based citizenship norms may affect voting behavior; and third, neither type of citizenship norm has any impact on affiliation with

* Corresponding Author,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Election Study Cente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political parties. Additionally, we further utilize a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to dissect different components that may have caused the change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rom 2004 to 2014. We found that over the period of time, the changes in active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party affiliation have been mainly affected by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linkages betwee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ange in voting behavior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changes in determinants.

Keyword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itizenship norms, cultural model, social structure model, attitudinal model

一、前言

民主體制下，公民的政治參與可視為政治系統運作的輸入端（input）——即公民透過不同形式的參與，凝聚政策需求，並和政策輸出（output）產生反饋的循環（Lijphart 1997; Verba 1996）。換言之，公民政治參與是民主體制運行的必要條件，不但是政策形成過程的起始端，甚至是民主政體合法性（legitimacy）的來源（Dahl 1989）。然而，如果從「自利」或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角度出發，公民的政治參與始終面臨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困境。由於個人不需付出參與成本即可坐收他人行動後的成果，個人會有「不參與」或「搭便車」（free ride）的動機（Olson 1965）。

如果是這樣，為何我們還會看到那麼多的公民透過不同的形式參與政治？顯然，政治參與不全然是工具理性計算下的產物。就以投票行為為例，儘管學者基於理性選擇思維，從「成本—效益」的觀點建

立了個體投票參與模型。但在實證分析層面上，該模型中最能解釋單一選民為何會去投票的關鍵變數，往往不是候選人當選後所可能帶給她的效益，也不見得是她去投票時所付出的成本，而是基於其認知到的公民責任（duty: D-term）（Riker and Ordeshock 1968; Blais et al. 2000）。換言之，將投票視為是好公民的「一項責任」，才是驅使個人去投票的主要原因。

近年來，從苗栗大埔案爭議、洪仲丘事件、到318學運、反課綱運動等，公民草根性的政治參與一再成為媒體及全國焦點。這些運動不論從參與人數的多寡、投入資源的規模，或是議題論述的廣度及深度等角度來觀察，都對公共政策制定乃至於社會整體價值觀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力。換言之，公民參與政治的模式，已不再侷限於傳統投票行為。許多非投票行為的政治參與模式，譬如草根運動串連，似乎有增加的趨勢。以美國為例，就有學者分析調查資料後發現，過去數十年來儘管投票率持續下降，但這只是因為年輕、新一代的選民更傾向於參與其他「非常規」（unconventional）的政治活動（Dalton 2009）。譬如，許多選民會針對特定議題或社群，自願地透過參與甚至組織社區團體，更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並影響公共政策，而不是只是被動地等待投票機會來臨時才發聲（Zukin et al. 2006）。

顯然，台灣經歷民主化歷程後，民眾對於自身在公共事務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轉變中，從以前只強調做好自己本分的「好人民」，漸漸轉變成捍衛弱勢權益，勇於發聲的「好公民」。然而，現代的「好公民」在經驗研究中應該如何定義？如果我們利用公民權的概念來定義「好公民」的價值觀，則台灣這幾年的民主化歷程，特別是從民主轉型期過渡到民主鞏固期之後，是否形塑了與以往不同的公民價值或公民規範，進而促成了不同於以往的公民政治參與模式？換言之，民

眾之所以更積極、或更消極地參與某類型政治活動，背後的因素是否肇因於其本身對於公民規範的認知有所轉變？或是其他因素或影響機制的轉變？本文旨在分析 2004 年及 2014 年「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的資料，除了探討民眾公民規範認知的轉變以外，還將關注公民規範認知與不同政治參與類型間的關聯性。此外，本研究同時從諸多影響政治參與的因素出發，探討十年間政治參與行為的改變，究竟應該歸咎於影響因素的「量變」（譬如個人認知與態度的轉變），還是源於影響機制的「質變」（譬如社會環境脈絡的變遷）？本文以下各節安排如下：第二節回顧政治參與及公民規範認知的相關理論；第三節說明研究假設及變數操作，並比較兩個年度的實證資料，包括描述性統計及統計模型分析；第四節則利用反事實分析模型，探討十年之間，影響政治參與因素的「量變」與「質變」；第五節為結論。

二、政治參與及公民規範的相關理論

爲什麼民眾會參與政治？除了理性選擇學派以外，過去的相關研究也從社會學及心理學的角度，歸納出三項研究途徑，來解釋民眾的政治參與，包括社會結構途徑（social structure model）、態度途徑（attitudinal model）、以及文化途徑（cultural model）（Norris 2002）。其中，社會結構模型宣稱：造成社會分歧（cleavages）的諸多要素，舉凡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種族、甚或階級等，同時也反映了個人在參與政治活動時，資源（如：金錢或時間）及能力（如：知識與技能）方面的差異。此外，個人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或個人是否歸屬於某特定團體等諸多「個人—社會」的連結，也會影響一個人參與政治的動機。譬如，對於工會成員而言，工會組織的網絡及動員往往是解釋其

成員參與政治活動的重要因素。總之，社會結構模型強調，個人參與政治與否，主要的原因來自於社會結構中的差異。

雖然社會結構的觀點有助於我們從群體的角度解釋個人參與政治的動機，但這項觀點不足以解釋，在相同的社會結構當中，為何仍存有個體間的差異？譬如，不是所有工會成員都會聽從工會的動員，去參與特定的政治活動。因此，心理態度途徑揚棄從社會結構來解釋個人行為的視角，而選擇直接從個人心理或態度出發，主張民眾參與政治活動主要是基於其特定的心理態度，強調「態度—行為」的連結。舉例來說，個人對於政治及公共事務的興趣 (political interest)，或個人對於其是否能夠影響公共事務的認知 (即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 等，都會影響個人參與政治活動的動機 (Anderson and Hoff 2001; Martin and Van Deth 2007; Pattie et al. 2003; Stolle et al. 2005)。儘管這一派的學者承認，個人的政治態度其實也是鑲嵌在社會文化或社會結構當中，其源頭還是來自社會，不會無中生有。不過，從個體的層次來看，就算社會結構是形塑個人態度的主要因素，但其效果在個體之間仍存在程度上的差異。因此，心理態度途徑主張，不論社會結構的影響力為何，探討個人態度與行為之間的連結還是較為直觀。過去許多實證研究結果也顯示，在控制了社會結構因素的情況下，個人態度的變數對於其行為仍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釋力。

如果我們從廣義的文化角度來看，個人的態度也可能是特定文化 (或價值觀) 下的產物。換言之，一個人的心理態度不但會受到特定社會結構的影響，也會受到特定文化 (或價值觀) 的制約，進而產生特定的行為 (Inglehart 2008; Inglehart and Baker 2000; Lipset 1996)。當我們試圖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公民的政治參與時，和公民權 (包括公民的權利 [rights] 與責任 [responsibility]) 直接相關的規範性價值即

顯得尤其重要 (Bolzendahl and Coffé 2013)。因此，從文化途徑的角度出發，學者往往聚焦在公民規範 (norm) 如何形塑民眾的政治參與 (Blais et al. 2000; Dalton 2009; Opp 1986; Raney and Berdahl 2009)。這裏所描述的公民規範，內容上強調責任的面向 (Sandel 1998)，形式上則泛指一種文化現象，而作用上則被視為是一種調節、引導政治行為的重要機制 (Hechter and Opp 2001)。Dalton (2008: 78) 在其跨國比較研究中定義：公民規範是指民眾在政治生活裏，對於其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具有一種共同的期望；或是指公民對於其必須遵從的各項行為標準，有一種共同的期待。然而，在不同的國家或區域當中，不論是公民規範的內涵，或是各項公民規範與實際政治參與間的連結，往往存在不同的形態。換言之，即使是看似相同的公民規範，不同國家的公民往往也有不同的解讀 (Jasso and Opp 1997; Rossi and Berk 1985)。

然而，倘若我們無法定義公民規範的意涵，則又如何探討公民規範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聯性？於是，學者針對公民規範這項概念，除了充實理論上的內涵外，也從實證研究的角度，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測量面向。具體而言，公民規範強調一個公民在責任的框架下，「應該」（或「不應該」）做哪些事情。在這個理論框架下，學者對於公民規範的面向與測量，已有豐富的研究。譬如，有些學者先從理論層面出發，將公民規範的內涵化約成三個面向，包括政治活動 (political activity)、公民職責 (civic duty)，及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Janoski 1998; Lister 2003; Marshall 1950)，並發展相對應的測量項目，包括將選舉都去投票、積極參與社會與政治團體、及隨時關注政府作為等視為是政治活動；將從不逃漏稅及遵守本國的法律等視為是公民職責；將瞭解不同的意見、因為政治或是道德的理由購買商品，及幫助國內

外生活比較差的民眾等視為是社會責任 (Bolzendahl and Coffé 2009)。這種三面向的分類方式涵蓋了不同層次(即包括政治、法律及社會層次)動機面的測量,雖然深具理論意涵;但經驗證據顯示,並非各國民眾所認知到的公民規範,都可歸納入這三個面向。換言之,當我們將公民規範化約成三個面向時,理論與實證資料間存有不少的落差 (Bolzendahl and Coffé 2013)。過去徐火炎(2006)針對台灣公民權的研究,嘗試以較多的問卷題目建構出五個公民權面向,包括「愛國與人道義務」、「政治義務」、「社會經濟權利」、「政治參與權利」、及「公民禮儀」等所謂「兩種義務、兩種權利與一種德行」的內涵。當然,增加構面的作法確實能夠讓我們更全面地掌握公民權的概念,但所獲得的諸多構面同時也讓理論的系統脈絡瑣碎化,甚至降低其中核心構面的測量效度,並使得未來的實證研究更受限於調查時所使用的題組數量。

Dalton (2008; 2009) 則採用了較簡化的方式,單純地從被動服從與主動參與的角度,將公民規範劃分成兩個面向:包括義務規範認知 (duty-based citizenship norms) 與參與規範認知 (engaged citizenship norms)。從實證研究的觀點視之,義務規範認知指涉的是與政治或社會秩序直接相關的項目,譬如投票責任感、從不逃漏稅等;而參與規範認知的範疇則包含了各式非選舉活動的參與,以及是否應該理解他人意見、協助比我更差的人等。當然, Dalton 這種區分的方式並非從天而降,也非一成不變。他認為公民規範主要是反映社會與政治現代化進程,所形成的認知會與時俱進,其影響民眾政治參與行為的層面自然也會跟著轉變 (Dalton 2008)。換言之, Dalton 的區分方式是將公民規範視為現代化進程下的產物,儘管只從消極與積極的動機面來解構公民規範,且在不同國家或不同時期的經驗研究當中,兩個面向所

指涉的具體項目或有不同，但由於這兩個面向的公民規範簡潔易懂，且與個人政治參與之間有較好的連接，因此廣為經驗研究者採用。本文後續的實證分析也採用 Dalton 的分類概念。

總之，文化途徑強調：信念與價值會影響個人的政治行爲，且該影響力是獨立於社會結構以外的。那針對政治行爲而言，爲何會受到公民規範的影響？我們可以將民眾對於公民規範的認知視爲一種特別形式的信念或態度，因爲其規範性（normative）的特質，容易形成內在（來自個人內心）或外在（來自社會壓力）的課責機制（Hechter and Opp 2001; Horne 2003; Knack 1992; Liefbroer and Billari 2010）。因此，一旦公民規範的認知形成，該項認知將成爲引導個人行爲的指標。過去諸多的經驗研究即顯示，個人的政治行爲與其對公民規範的認知是一致的（Andersen and Hoff 2001; Blais et al. 2000; Dalton 2008; Horne 2003; Schwartz and Bardi 1997; Theiss-Morse 1993; Van Deth 2007）。

但是，學界並非全然接受上述「規範引導行爲」這項論點。畢竟，規範與行爲之間的連結，並非都清晰直接。事實上，當規範並非經由生活的經驗內化成本身的認知時，這樣的連結便有缺陷（Peffley and Rohrschneider, 2003），即對一般民眾而言，許多規範很可能只是「政治正確」的高調，民眾並不會確實遵守或尊重。又，倘若某一規範和多重的參與形式連結，或不同的規範和同一參與形式連結，則「規範一行爲」之間的連結關係也不容易明確定義。

儘管如此，關於規範與參與之間的實證研究仍然很多。譬如，針對民主國家當中最重要的政治參與：投票行爲，很多實證研究即發現，當一個人將投票視爲一項重要的公民責任時，則選舉時他就很可能每次都去投票，說明了規範對於投票行爲具有正向的影響效果（Armingeon 2007; Blais et al. 2000; Knack 1992; Muller 1982）。此外，針對非投

票行爲，許多研究亦指出，某些公民規範與激烈的抗爭行動有關聯性 (Muller 1982; Opp 1986, 1994; Opp et al. 1981)。由於公民規範與參與行爲的類型很多，學者爲了理論化兩者間的關聯，許多實證研究都採用類似 Dalton 的分析途徑，先簡化公民規範的面向，再探討不同面向的公民規範與政治參與行爲之間的連結。譬如，Raney and Berdahl (2009) 研究加拿大的調查資料後指出，加拿大也有如同 Dalton 所定義的兩個不同面向的公民規範，分別對於選舉行爲與非選舉行爲有不同的影響：具體而言，參與規範認知與非投票行爲有顯著的關聯，而義務規範認知則與投票行爲有高度的正向關係。

三、研究假設與跨時資料比較

本研究基於上述既有的研究發現與相關理論，希冀利用台灣的實證資料，來驗證公民規範與政治參與之間是否存有關聯性。具體而言，本文的核心假設有以下兩點：第一、諸如「選舉都去投票」、「繳稅」、以及「遵守法律」等概念，可歸因爲義務規範認知，會與常規性、制度性的政治參與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如投票與黨員身分），但是對於不屬於常規性的政治參與並不會有影響。第二、諸如「積極參與社團組織」、「理解他人意見」、「基於政治或道德理由消費」等概念，可歸因爲參與規範認知，與非常規的政治參與有正向影響，而不會與常規性、制度性的參與有顯著的相關性。換言之，被動服從的公民規範認知，會影響一個人的制度性政治參與；而主動參與的公民規範認知，則會影響一個人的非制度性政治參與。

另外，台灣在 2000 年以來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從民主轉型期步入民主鞏固期後，公民規範認知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是否有所轉變，

也是本文關注的焦點。過去跨國的研究顯示，新興民主國家，特別是東歐國家的公民，或許基於過去共產或威權政權的洗腦，民眾對於公民規範的概念和西歐各國相比，存在不同的想像，且公民規範認知與政治參與間的連結性遠不如西歐老牌民主國家（Schwartz and Bardi 1997）。學者針對這種落差，主要的解釋聚焦在「民主學習」：即在過去威權體制下，民眾的政治參與受到很大的限制，使得公民規範認知與政治參與之間不存在具體的連結。於是，新興民主國家的民眾在民主化初期時，對於民主權力的行使，尚未養成習慣，自然就無法產生規範的力量，來指引更全面的政治參與，特別是非常規性的政治參與，譬如請願、在媒體上發表政治評論等（Mishler and Rose 2002）。換言之，唯有在民主化之後，透過參與的機會與學習的機制，瞭解政治參與的意義，並進一步具象化民主環境下的公民規範認知，來引領實際的政治參與。（Howard 2002; Peffley and Rohschneider 2003; Hutcheson and Korosteleva 2006; Marquart-Pyatt and Paxton 2007）。

總之，跨國研究不但點出了新興民主國家與老牌民主國家在公民規範認知上的差異，還驗證了兩者在公民規範與政治參與的連結度上有顯著的不同。Dalton（2008）就強調，這樣跨國間的差異，其實突顯了各個國家之間政治與社會現代化進程的不同。在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民眾有能力追求更好的教育、生活品質等，繼而產生不同以往的公民規範認知，然後影響政治參與。過去數十年間，許多國家的民眾認為義務規範認知已經越來越不重要，而這樣的認知漸漸反映在常態性或制度化的政治參與面向上。譬如，現時美國民眾相較於過去，更不願服從權威，對於政府更不信任，以及更不願意去投票。這些行為面的表徵被認為是義務規範認知被削弱的反射（Bennett and Bennett 1990; Nevitte 1996）。而參與規範認知的概念和 Inglehart（1990）所描

述先進工業社會中追求的「後物質主義」價值十分類似——由於教育水準提升，世代經驗改變等因素，當物質生活較為豐足後，民眾會進一步追求自由、權利、進步等價值，並期待有更好的環境以及更公平的社會。而當民眾具備了這樣的規範認知後，便降低了對傳統及權威規範的服從，換言之，民眾會更傾向自主表達個人意見，並期望直接參與決策。

本文將上述跨國研究的發現，轉化成跨時的假設來檢證台灣民主化歷程當中，是否在不同時期（即不同的現代化進程），影響民眾政治參與的因素有所轉變？如果有，則又是如何改變的？換言之，台灣在民主轉型期（譬如 2004 年）和民主鞏固期（譬如 2014 年），如同新興民主國家與老牌民主國家之間的差異。

本研究使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公民權組資料進行分析，¹ 根據台灣 2004 年與 2014 年兩個年度的資料，去檢視公民規範對於不同政治參與的影響效果。由於本研究旨在比較 2004 年與 2014 年兩個年度中，民眾的公民規範認知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效果。我們首先檢視：台灣民眾的公民規範認知在兩個不同年度當中，分別呈現怎樣的面貌？是否有所差異？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測量公民規範認知的方式，完全採用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ISSP) 的共通題組，以民眾在理念上認為一個公民應該具備何種條件的重要程度為基準，依序詢問受訪者對於各項特定公民規範的看法。具體操作的量表是以 1 表示非常不重要，7 表示非常重要。

兩個年度的調查都包括了九項公民規範認知。其中，有六項規範

1 本論文使用資料全部係採自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14 年 3 月改制為科技部）資助之「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四期第五次計畫與第六期第五次計畫，該計畫係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執行。

表 1 2004 與 2014 公民規範認知兩年度差異

| | 2004 | 2014 | 兩年度 相減 14-04 | t-test |
|------------------------------|------------------|------------------|--------------------|--------|
| | 平均數 (標準差) | 平均值 (標準差) | | |
| 選舉都去投票 | 5.921 (1.443) | 5.362 (1.707) | -0.559 | *** |
| 從不逃漏稅 | 6.263 (1.191) | 6.245 (1.253) | -0.018 | |
| 遵守法律與規定 | 6.375 (1.056) | 6.471 (1.009) | 0.096 | ** |
| 隨時注意政府的施政作為 | 5.615 (1.510) | 5.416 (1.542) | -0.199 | *** |
| 積極參與社會或政治團體 | 4.098 (1.772) | 3.777 (1.717) | -0.321 | *** |
| 儘量去了解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 | 5.146 (1.691) | 5.262 (1.649) | 0.116 | * |
| 有些東西就是貴一點，也會為了政治的，倫理或環保的考慮去買 | 4.782 (1.792) | 4.648 (1.720) | -0.134 | * |
| 幫助國內（台灣）在生活上比您差的人 | 5.712 (1.328) | 5.766 (1.217) | 0.054 | |
| 幫助世界上各地生活比您差的人 | 4.765 (1.720) | 4.745 (1.673) | -0.020 | *** |

說明：*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資料來源：章英華、傅仰止（2005）、傅仰止等（2015）。

認知的分數是 2004 年高於 2014 年，包括「選舉都去投票」、「從不逃漏稅」、「隨時注意政府的施政作為」、「積極參與社會或政治團體」、「為了政治、倫理或環保考量購買東西」，及「幫助世界上各地生活比

您差的人」，而僅有三項是 2014 年高過 2004 年，包括了「遵守法律與規定」、「盡量去瞭解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以及「幫助在國內生活比您差的人」。另外，九項公民規範認知當中，有七個項目的平均值在兩個年度中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只有「從不逃漏稅」及「幫助在國內生活比您差的人」等兩項公民規範認知，兩個年度的平均數並無顯著差異。綜合來看，這九項公民規範認知的測量值，在 2004 年及 2014 年間或有增減，無法歸納出一個特定的趨勢，且實質的差異有限。但若從項目之間相對比較的角度來看，我們發現「選舉都去投票」這項通常屬於義務規範認知的項目，十年來在民眾心目中的重要性下降幅度最大（下降 0.56 分），而「盡量去瞭解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的這項屬於參與規範認知項目，在民眾心目中的重要性則提升最多（上升 0.12 分）。

進一步，我們把公民規範認知的九個項目，透過主成分分析之後，再利用轉軸法，區分成如 Dalton 定義的兩個面向：分別是義務規範認知與參與規範認知，而所擷取的這兩個面向，前者構成的項目包括「選舉都去投票」、「從不逃漏稅」、「遵守法律與規定」，及「隨時注意政府的施政作為」等四項；後者則包括了「積極參與社會或政治團體」、「盡量去瞭解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有些東西就是貴一點，也會爲了政治的、倫理或環保的考慮去買」、「幫助國內（台灣）在生活上比您差的人」、「幫助世界上各地生活比您差的人」等五項。藉由這兩個面向，我們希冀得出個別受訪者在這兩個規範面向上的分數。爲了使得檢證測量結果很穩健（robust），本研究分別使用因素分數與加總分數兩個方式來討論，並希望能夠使用最適當方式來進行後續的模型分析。事實上，主成分分析之後所獲得的受訪者個別因素的分數，與直接將受訪者在定義的兩個面向上，各題的分數加總起來所獲得的總分

之間，兩者的關聯性非常地高。² 不過由於因素分數的建構，是利用當一年度的資料進行因素分析之後所求得的一個分數，這樣的方式主要是利用調查年度中受訪者資料間的關聯性，所建構起來的一個相對指標。然而，當我們要利用這樣的方式進行跨年的比較時，兩個年度的相對分數就不適合進行彼此間的比較。換言之，倘若兩個年度的變數結構不一致，即使萃取的因素同樣都只有兩個，但其建構的原因可能並不相同，使得跨年的指標無法直接比較。因此，為了建構兩個不同年度但具有可比性的指標，我們把屬於參與規範認知與義務規範認知的題目分別加總並標準化，來做為公民規範認知測量的指標。表 2 比較兩個年度不同規範認知的平均值，並檢定跨年的差異是否顯著。在參與規範認知方面，2014 年的平均分數較 2004 年略低，但差異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而義務規範認知的平均分數雖呈現同樣的趨勢，即 2014 年的平均分數略低於 2004 年，不過兩個年度的差異達

表 2 2004 與 2014 公民規範認知平均分數描述統計

| | | 2004 年 | 2014 年 | 平均數檢定 |
|--------|-----|--------|--------|-------|
| 參與規範認知 | 平均數 | 0.692 | 0.684 | |
| | 標準差 | 0.170 | 0.154 | |
| | 樣本數 | 1675 | 1749 | |
| 義務規範認知 | 平均數 | 0.858 | 0.833 | |
| | 標準差 | 0.137 | 0.144 | *** |
| | 樣本數 | 1701 | 1788 | |

說明：*** $p < 0.001$

資料來源：章英華、傅仰止（2005）、傅仰止等（2015）。

2 本研究針對兩種不同方式建構的面向分數進行相關性分析，相關表格請見附錄一。

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換言之，從 2004 年到 2014 年這十年間，民眾普遍認為義務規範認知的重要性下降，雖然下降的幅度不大。而另一方面，民眾對於參與規範認知的認知則沒有顯著的改變。這樣的發現和西方過去跨國研究的發現有吻合之處——即隨著社會及政治現代化的推展，義務規範認知的重要性會逐漸下降。不過，公民規範認知的轉變是否會反映到政治參與行為，還有待本文後續的討論與分析。

討論完公民規範認知在不同面向及不同年度的異同後，雖然我們無法歸結出一個特定的變化趨勢，但至少可以認定：在使用相同測量項目或構面的情況下，十年間平均值的增減幅度相當有限，有些項目或構面甚至可說沒有變化。倘若做為本研究的核心自變數公民規範認知沒有太大的變化，那本研究的依變數——政治參與，是否也同樣沒有顯著的變化？接著，我們比較民眾的政治參與在 2004 年及 2014 年間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

針對政治參與的內涵，西方實證研究往往將政治參與分成不同的面向，譬如選舉活動 (electoral activities) 與非選舉活動 (non-electoral activities) (Verba and Nie 1972)；或慣常性 (conventional) 與非慣常性 (unconventional) 行為 (Barnes and Kaase 1979)。一般而言，慣常性的政治參與指涉的是被政治文化視為合理的行動：包括投票、競選、參與競選活動、試圖去影響改變政府作為，或是相關政策的作為。非慣常性的政治參與包含了示威遊行、抗議等活動，包括了合法與非法等體制外的政治作為。

本研究參考上述的分類方式，根據行為發生的場域，將政治參與區分成三個測量面向，包括積極的政治參與、單純投票行為，及是否參加政黨等。這樣的分類方式並非本研究首創，本文第二部分所回顧的諸多文獻幾乎都是以「多元構面」來呈現政治參與行為。具體而言，

本文所定義的積極政治參與包括了八種不同的參與方式，即：「請願連署」、「特定理由拒買或是購買某些產品」、「參加示威遊行」、「參加政治集會或造勢活動」、「找政治人物表達看法」、「捐錢給某個社會或政治活動」、「透過媒體表達意見」，及「透過網路表達政治想法態度」等。這八種政治參與方式和定期投票相比，皆較屬於「非慣常性」的政治參與，也不需要特定場域中（譬如投開票所）才能完成。在編碼時，我們將這八種政治參與模式分別簡化為是否曾參與某特定活動（譬如是否曾參加示威遊行？）或曾從事某特定行為（譬如是否有請願連署過？）。在觀察樣本次數分布情況後，我們將五種以上的次數編入類別 5（五種及以上）當中，畢竟參與過五種以上活動的比例較低，因此以此方式分類。至於投票行為及政黨參與這兩個面向的測量方法則相對直觀，只是詢問受訪者是否曾投票過或是否參加過特定政黨或為該黨黨員。表 3 總結了不同政治參與面向的次數分配。

透過表 3 我們發現，與 2004 年的調查資料相比，2014 年時民眾積極參與政治的比例有顯著提升，譬如過去曾參與五項以上者的比例，就增加了 3.07 個百分點。相對地，過去都沒有參加前述八項積極性政治行為的比例，2014 年的調查結果較 2004 年下降了超過 11 個百分點。合併這兩項結果來看，近年來民眾曾以「非慣常」方式參與政治的比例是增加的。從 tau-c 檢定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這兩個年度的變化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然而，當我們審視投票參與及是否具備黨員身分這兩項「慣常性」的政治參與時發現，³ 2014 年參與的比例都較 2004 年來得低，分別下降了 2.07 及 6.94 個百分點。透過卡方檢定，我們發現兩個年度的

3 2004 年的總統選舉實際投票率為 80.28%，2012 年的總統選舉投票率為 74.38%。

表3 2004與2014兩個年度政治參與的次數分配表 (%)

| 參與種類 | 年 度 | 2004 | 2014 | 比例相減 (14-04年) | |
|----------------|-----|------------------|------------------|------------------|----------------------------|
| 積極 政治 參與 | 0 | 834 (49.70) | 674 (38.17) | -11.53 | tau-c=0.119 p<0.001 |
| | 1 | 398 (23.72) | 440 (24.92) | 1.20 | |
| | 2 | 201 (11.98) | 275 (15.57) | 3.59 | |
| | 3 | 120 (7.15) | 164 (9.29) | 2.14 | |
| | 4 | 71 (4.23) | 102 (5.78) | 1.55 | |
| | 5 | 54 (3.22) | 111 (6.29) | 3.07 | |
| | | | | 有參與的 比例相減 | |
| 投票 | 有參與 | 1,299 (86.54) | 1,409 (84.47) | -2.07 | $\chi^2=2.723$ p<0.05 |
| | 沒參與 | 202 (13.46) | 259 (15.53) | | |
| 黨員身份 | 有參與 | 414 (23.26) | 303 (16.32) | -6.94 | $\chi^2=27.670$ p<0.001 |
| | 沒參與 | 1,366 (76.74) | 1,554 (83.68) | | |

資料來源：章英華、傅仰止（2005）、傅仰止等（2015）。

投票參與程度並沒有達到統計上顯著的差異。畢竟投票參與仍是最基本的政治參與方式，十年間雖略有下降，但仍然是民眾最重要的政治參與模式之一。至於參加政黨這一項，十年間顯然就有很大的改變。特別是國民黨黨員在台灣民主化後大量流失，使得入黨已非台灣民眾參與政治的主要選項。透過卡方檢定，我們也看出這兩個年度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就整體政治參與模式來說，台灣民眾在進入民主鞏固期後，似乎更積極地利用「非慣常性」的管道參與政治。與此同時，「慣常性」的參與途徑，包括投票及加入政黨，過去經歷過的比例則不升反降。這種政治參與方式的轉變是否肇因於公民規範認知的轉變？事實上，如果單純從上述描述性統計來看，我們發現民眾在 2004 年及 2014 年這兩個調查時間點上，公民規範認知的變化有限，但參與行為的變化則較明顯，這是否意謂「規範—行為」之間根本不存在特定的關聯性？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我們首先觀察不同年度的公民規範認知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連結程度。具體而言，我們利用有序勝算對數模型（針對積極政治參與）以及二元勝算對數模型（針對投票行為及政黨參與），來探討公民規範對政治參與的影響。除了將兩個面向的公民規範認知設定為主要自變數外，本研究還根據過去西方及台灣的文獻，在模型中加入政治效能感（Campbell et al. 1960; 黃秀端 1995; 黃信豪 2006; 陳陸輝、耿曙 2008）、政治興趣（Verba et al. 1995）、政黨認同（DeNardo 1980; Knack 1994; Tsai 2001; 徐火炎 2005; 陳陸輝、耿曙 2008），及人口變數（包括性別、職業、教育程度）（Leighley 1995; Tsai 2001; 楊婉瑩 2007; 崔曉倩、吳重禮 2011）等做為控制變數。畢竟，這幾個控制變數不但代表了從社會結構途徑（即人口變數）或態度途徑（即各項政治態度）來解釋政治參與，同時也和本研究的

核心自變數——公民規範認知，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因此需要加以控制（徐火炎 2006）。⁴ 另外，本研究採用反事實分析方法，透過不同年度資料所建構的統計模型，並將變數資料交互替換後，來探討公民規範認知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是否存有跨年的差異？又，如果有差異，則造成差異的原因為何？具體來說，當我們觀察從 2004 年到 2014 年，民眾積極參與政治的比例增加了（或投票、成為黨員的比例減少了），則這樣的變化有多大程度可歸因於影響因素（即公民規範認知、人口變數、政治態度）本身的改變？或者，有多大程度可歸因於影響因素與政治參與這兩者之間連結程度的改變？

過去，反事實分析主要應用於經濟學的實證研究。近年來此一研究方法也較廣泛地應用於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希冀透過統計模型探討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黃紀 2008；關秉寅、李敦義 2008）。就本研究而言，即使我們能夠確認公民規範認知與政治參與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關聯性，則當我們發現民眾在 2004 年到 2014 年這十年間「非慣常性」的政治參與增加了，仍無法直接推論這樣的增加究竟是肇因於公民規範認知的改變，還是時空環境的改變？除非我們把 2004 年的受訪者原封不動地搬到 2014 年再訪問一次，才可進一步確認「規範—行為」間互動的關係。這也是反事實分析方法的邏輯，即將同一筆資料置於不同組別當中（例如：不同年度的模型），來探討不同組別間，依變數變化的原因。舉例來說，Machado 和 Mata（2005）即透過反事實分析方法，解析工資變化的原因。其模型理論的背景是建立在機率積分轉換理論（probability integral transformation theorem），透過挑選工資中不同分量的各個位置，給定一組解釋變數，藉此估計工資所得分

4 有關各個變數的編碼及敘述統計，請參見附錄二及附錄三。

配的結果，模型的估計係數則進一步描述解釋變數對不同依變數分量的影響程度。Machado 和 Mata 並透過此模型解構造成兩個年度（1986 年至 1995 年）工資差異的原因，並比較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工作資歷等自變數之間，究竟哪一個變數是解釋工資變化的主因。陳建良與曹添旺（2012）的研究也同樣透過此一方式，來解構不同年度之間，人力資本變數與工資所得之間的關係。首先，他們先利用統計模型分析教育、工作經驗、性別、婚姻狀態、與公私部門特性等人力資本變數，是否在不同年度對於受雇人員的工資所得產生影響。其次，他們進一步分析造成不同年度工資分配差異的原因，即利用反事實分析方法，將工資差異歸因於人力資本變數的變異及模型係數的（報酬率）變化。

本研究分別利用兩個年度的資料，並設定統計模型，得出不同種類的政治參與之預測機率。繼之，我們將不同年度的資料帶入不同年度的模型當中（譬如：將 2004 年的調查資料帶入 2014 年的預測模型當中），便可以得出，從 2004 年到 2014 年間，資料本身的變動造成預測機率變異的程度，並進一步將預測機率的變異歸因——是變數本身的改變或是模型係數的改變。不過此一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一個很強的假定上：不同年度的模型都使用相同的自變數（或解釋變數），即模型設定（model specification）是不變的。另外，這樣的分析方法並不是定群追蹤資料分析（panel data analysis），只是我們假定 2004 年的受訪者來到了 2014 年後，其政治參與的變化有多大程度是各項解釋變數所造成的，且這群人的變異可以和原本 2014 年的受訪者做比較。

當我們以積極政治參與程度做為依變數時，表 4 總結了 2004 年及 2014 年兩個有序勝算對數模型的分析結果。其中，公民規範的兩個面向當中，參與規範認知與積極政治參與之間的正相關性達到統計上的

表4 積極政治參與有序勝算對數模型

| | 2004 (模型一) | | | 2014 (模型二) | | |
|-----------|------------|-------|---------|------------|-------|---------|
| | B | S.E | Exp (B) | B | S.E | Exp (B) |
| 公民規範 | | | | | | |
| 參與規範認知 | 1.285*** | 0.351 | 2.795 | 1.075** | 0.347 | 2.929 |
| 義務規範認知 | -0.132 | 0.432 | 0.876 | 0.021 | 0.377 | 1.021 |
| 教育程度 (國小) | | | | | | |
| 國初中 | 0.344 | 0.191 | 1.411 | 0.195 | 0.211 | 1.215 |
| 高中職 | 0.487** | 0.184 | 1.627 | 0.361 | 0.189 | 1.435 |
| 專科 | 0.407 | 0.211 | 1.502 | 0.523* | 0.219 | 1.686 |
| 大學及以上 | 0.923*** | 0.222 | 2.517 | 0.793*** | 0.220 | 2.210 |
| 年齡 | 0.003 | 0.004 | 1.003 | 0.004 | 0.004 | 1.004 |
| 職業 (農林漁牧) | | | | | | |
| 藍領 | 0.316 | 0.240 | 1.370 | 0.078 | 0.294 | 1.081 |
| 中低階白領 | 0.315 | 0.271 | 1.370 | 0.633* | 0.316 | 1.883 |
| 中高階白領 | 0.299 | 0.285 | 1.349 | 0.548 | 0.329 | 1.729 |
| 其他 | 0.120 | 0.260 | 1.127 | 0.033 | 0.398 | 1.034 |
| 性別 (女性) | | | | | | |
| 男性 | -0.099 | 0.107 | 0.906 | -0.153 | 0.095 | 0.858 |
| 政治效能感 | | | | | | |
| 外在政治效能感 | -0.004 | 0.027 | 0.996 | 0.001 | 0.022 | 1.001 |
| 內在政治效能感 | 0.171*** | 0.041 | 1.186 | 0.170*** | 0.033 | 1.185 |
| 政治興趣 | 0.704*** | 0.068 | 2.022 | 0.496*** | 0.063 | 1.642 |
| 政黨認同 (泛藍) | | | | | | |
| 泛綠 | -0.139 | 0.132 | 0.870 | 0.195 | 0.142 | 1.215 |
| 中立無反應 | -0.701*** | 0.129 | 0.496 | -0.160 | 0.118 | 0.852 |
| 截距 | | | | | | |
| Cut1 | 3.413 | 0.517 | | 2.675 | 0.525 | |
| Cut2 | 4.647 | 0.523 | | 3.869 | 0.530 | |
| Cut3 | 5.503 | 0.528 | | 4.791 | 0.535 | |
| Cut4 | 6.375 | 0.535 | | 5.540 | 0.539 | |
| Cut5 | 7.313 | 0.548 | | 6.338 | 0.545 | |

表 4 積極政治參與有序勝算對數模型（續）

| | 2004 (模型一) | | | 2014 (模型二) | | |
|------|--|-----|---------|--|-----|---------|
| | B | S.E | Exp (B) | B | S.E | Exp (B) |
| 模型資訊 | N=1,507 LR chi ² (17)=365.11*** Pseudo R ² =0.0861 | | | N=1,554 LR chi ² (17)=302.05*** Pseudo R ² =0.0608 | | |

說明：*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資料來源：章英華、傅仰止（2005）、傅仰止等（2015）。

顯著水準，而模型中義務規範認知的係數則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就 2004 年的模型（模型一）而言，參與規範認知每上升一個單位，積極政治參與的勝算即為原本的 2.80 倍。同時，教育程度越高的民眾（以國小及以下為對照組），較可能從事積極政治參與。至於其他政治態度變數，模型一當中內在政治效能感及政治興趣的係數都是正的且顯著，符合理論預期，而中立選民的係數則是負的，顯示該類選民相較於具有政黨傾向者（以泛藍為基準），比較不熱衷參與政治。

表 4 中 2014 年的資料分析結果（模型二）同樣佐證了，參與規範認知會影響積極政治參與——即參與規範認知每上升一個單位，積極政治參與的勝算會是原本的 2.93 倍。在其他變數方面，教育程度（專科、大學及以上）、內在政治效能感，及政治興趣的係數同樣是正向且顯著的，即這些變數在模型中具備統計上的解釋力。此外，職業這個變數對於積極政治參與似乎也有影響，但只有中低階白領的係數是顯著（且正向）的，即該類的民眾相較於農林漁牧更會積極參與政治。而政黨傾向的相關變數在模型二當中，則變得不顯著。總之，不論其他控制變數的結果為何，2004 年及 2014 年的分析結果都確認了「規範一行為」間的連結，即民眾的參與規範認知對於積極政治參與有一

定程度的影響。

當以投票與否做為依變數時，表 5 顯示：義務規範認知的係數在模型三（2004 年）及模型四（2014 年）中雖皆為正向，但只有在模型四中顯著。⁵ 具體來說，模型四當中的義務規範認知每提高一個單位，民眾會去投票的勝算是原本的 14.61 倍。而參與規範認知的係數在模型三及模型四當中都不顯著，顯示這項公民規範認知並不影響投票參與。另外就人口變數而言，模型三的教育程度、年齡、及性別等都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相對地，模型四當中，雖然教育程度也不顯著，但年紀越大者越可能去投票（每增加一歲，會去投票的勝算是原本的 1.04 倍）、且男性較女性更不會去投票（男性會去投票的勝算相較女性減少了 44%）。至於政治態度的變數，模型三及模型四的結果都顯示，民眾的政治興趣越高，越可能會去投票，且中立選民較有政黨傾向者（以泛藍為基準），更不會去投票。不過，模型三當中的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正向且顯著的，但模型四當中兩項政治效能感變數都不顯著。⁶

當依變數為是否具有黨員身分時，表 6 的模型五（2004 年）及模型六（2014 年）皆顯示，公民規範的兩個面向，無論是參與規範認知或義務規範認知，其係數都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在人口變數方面，兩個模型結果皆頗為一致，其中教育程度較高的民眾（相對於國小程度），越可能成為黨員；年齡越長者，同樣越可能加入政黨；另外，性

5 模型三當中，義務規範認知的係數在 90% 的信心水準下（即 $p < 0.1$ ），是顯著的。

6 這裡必須提及一項資料限制；2014 年調查時，投票行為的題目是要民眾回顧 2012 年總統大選時是否有去投票。由於總統大選與調查時間已有段間隔，受訪者在回答時或許記憶已經模糊，又或只是為了滿足社會期待而回答「有去投」，因此結果的誤差可能比 2004 年的調查大一些。

表 5 投票行為的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 | 2004 (模型三) | | | 2014 (模型四) | | |
|-----------|--|-------|---------|--|-------|---------|
| | B | S.E | Exp (B) | B | S.E | Exp (B) |
| 公民規範 | | | | | | |
| 參與規範認知 | 0.234 | 0.562 | 1.263 | -0.457 | 0.587 | 0.633 |
| 義務規範認知 | 1.228 | 0.656 | 3.415 | 2.682*** | 0.545 | 14.613 |
| 教育程度 (國小) | | | | | | |
| 國初中 | 0.175 | 0.374 | 1.191 | -0.533 | 0.441 | 0.587 |
| 高中職 | -0.408 | 0.341 | 0.665 | -0.497 | 0.406 | 0.609 |
| 專科 | -0.491 | 0.393 | 0.612 | -0.562 | 0.442 | 0.570 |
| 大學及以上 | -0.725 | 0.406 | 0.485 | -0.563 | 0.449 | 0.569 |
| 年齡 | 0.015 | 0.008 | 1.015 | 0.039*** | 0.008 | 1.040 |
| 職業 (農林漁牧) | | | | | | |
| 藍領 | -0.872 | 0.561 | 0.418 | -0.896 | 0.788 | 0.408 |
| 中低階白領 | -0.519 | 0.611 | 0.595 | -0.640* | 0.812 | 0.527 |
| 中高階白領 | -1.111 | 0.620 | 0.329 | -0.953 | 0.824 | 0.385 |
| 其他 | -0.865 | 0.591 | 0.421 | -0.873 | 0.991 | 0.418 |
| 性別 (女性) | | | | | | |
| 男性 | -0.296 | 0.193 | 0.744 | -0.584*** | 0.165 | 0.558 |
| 政治效能感 | | | | | | |
| 外在政治效能感 | -0.076 | 0.049 | 0.927 | 0.024 | 0.379 | 1.024 |
| 內在政治效能感 | 0.139* | 0.070 | 1.149 | 0.067 | 0.555 | 1.069 |
| 政治興趣 | 0.376** | 0.129 | 1.456 | 0.364** | 0.114 | 1.439 |
| 政黨認同 (泛藍) | | | | | | |
| 泛綠 | -0.375 | 0.321 | 0.687 | -0.275 | 0.292 | 0.759 |
| 中立無反應 | -1.703*** | 0.279 | 0.182 | -1.000*** | 0.234 | 0.368 |
| 截距 | 1.354 | 0.937 | | -0.677 | 1.109 | |
| 模型資訊 | N=1,336 LR chi ² (17)=144.83*** Pseudo R ² =0.1439 | | | N=1,448 LR chi ² (17)=203.50*** Pseudo R ² =0.1601 | | |

說明：*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資料來源：章英華、傅仰止 (2005)、傅仰止等 (2015)。

表6 黨員身份的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 | 2004 (模型五) | | | 2014 (模型六) | | |
|-----------|--|-------|---------|--|-------|---------|
| | B | S.E | Exp (B) | B | S.E | Exp (B) |
| 公民規範 | | | | | | |
| 參與規範認知 | 0.281 | 0.458 | 1.324 | 0.145 | 0.582 | 1.156 |
| 義務規範認知 | 0.421 | 0.590 | 1.523 | -0.253 | 0.610 | 0.776 |
| 教育程度 (國小) | | | | | | |
| 國初中 | 0.612* | 0.269 | 1.844 | 1.470*** | 0.339 | 4.350 |
| 高中職 | 1.621*** | 0.246 | 5.056 | 2.014*** | 0.319 | 7.493 |
| 專科 | 1.706*** | 0.280 | 5.509 | 2.449*** | 0.355 | 11.580 |
| 大學及以上 | 1.164*** | 0.304 | 3.203 | 1.528*** | 0.382 | 4.611 |
| 年齡 | 0.048*** | 0.006 | 1.049 | 0.069*** | 0.007 | 1.071 |
| 職業 (農林漁牧) | | | | | | |
| 藍領 | 0.624* | 0.317 | 1.866 | 0.214 | 0.444 | 1.239 |
| 中低階白領 | 0.679 | 0.356 | 1.972 | -0.185 | 0.495 | 0.831 |
| 中高階白領 | 0.827* | 0.369 | 2.287 | 0.627 | 0.504 | 1.872 |
| 其他 | 0.220 | 0.357 | 1.246 | -0.144 | 0.723 | 0.866 |
| 性別 (女性) | | | | | | |
| 男性 | 0.765*** | 0.148 | 2.148 | 0.952*** | 0.169 | 2.590 |
| 政治效能感 | | | | | | |
| 外在政治效能感 | -0.029 | 0.036 | 0.972 | -0.033 | 0.036 | 0.967 |
| 內在政治效能感 | 0.132* | 0.054 | 1.141 | 0.113* | 0.056 | 1.120 |
| 政治興趣 | 0.224* | 0.087 | 1.251 | 0.387*** | 0.102 | 1.473 |
| 政黨認同 (泛藍) | | | | | | |
| 泛綠 | -0.665*** | 0.170 | 0.514 | -0.987*** | 0.221 | 0.373 |
| 中立無反應 | -0.915*** | 0.165 | 0.400 | -1.044*** | 0.178 | 0.352 |
| 截距 | -6.470*** | 0.700 | | -7.760*** | 0.850 | |
| 模型資訊 | N=1,563 LR chi ² (17)=302.75*** Pseudo R ² =0.1758 | | | N=1,609 LR chi ² (17)=364.70*** Pseudo R ² =0.2511 | | |

說明：*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資料來源：章英華、傅仰止 (2005)、傅仰止等 (2015)。

別也是一個顯著的變數，即男性民眾加入政黨的可能性較高。不過，模型五（2004年）當中職業的變數是顯著的，即藍領、中高階白領相較於農林漁牧，更可能加入政黨，但模型六（2014年）當中職業相關變數則不顯著。至於政治態度的變數，兩個模型都呈現相似的結果：首先，內在效能感與政治興趣的係數都是正向且達統計顯著水準，符合政治參與相關理論的預期。其次，兩個模型中政黨傾向變數的係數都是負的且顯著，顯示相較於泛藍民眾，泛綠或是中立無反應的民眾加入政黨的可能性較低。

黨員身分在台灣一直不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參與類型，過去相關的研究也很少。不過，在歐美國家，民眾加入政黨的比例相對高很多，特別在歐洲國家，由於工會與政黨之間的連結非常緊密，民眾相當容易因為加入某一特定工會，而直接或間接成為政黨的黨員（Scarrow and Gezgor 2010; Dalton 2009）。因此在國外的實證研究當中，黨員身分的研究相對重要。但在台灣，職業工會與政黨的連結並不如國外一般密切，甚至具有特定政黨認同者也未必會將此一認同轉化為實際加入政黨的動力。本文從黨員身分的角度來探討政治參與，算是一項初探，雖然並未發現兩項公民規範認知與黨員身份有直接的關聯性，但這項發現日後仍可和其他國家比較，畢竟黨員身分在跨國研究當中，仍然值得學者持續關注。

上述模型結果顯示，雖然使用不同年度的資料，但公民規範認知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基本上呈現一致的趨勢：即參與規範認知對於積極政治參與有顯著的影響，而義務規範認知則對於投票行為有較明顯的作用。至於政黨參與方面，模型中兩種規範認知的係數都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因此公民規範認知對於政黨參與的影響極為有限。不過，公民規範認知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程度是否在兩個年度都一

致？或是哪些方面產生了變遷？我們無法直接利用上述模型結果得出結論，需要進一步透過分析公民規範認知對於政治參與的「實質影響」(substantial effects) 來做比較。

我們於是先將兩個年度的資料合併，並在模型自變數的部分增加年度的虛擬變數及年度與兩項公民規範認知的交叉項。其中，年度的虛擬變數只會影響不同年度下，民眾政治參與機率的截距，但不影響公民規範認知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而如果交叉項的係數是顯著的，則表示公民規範認知影響政治參與的機制在年度間存有不同。進一步，我們透過合併資料後新的模型係數，並將其他自變數都設定為平均值的情況下，比較不同年度間，兩種規範認知與三種政治參與之預測機率的關係，藉以探討公民規範認知對於政治參與的「實質影響」，是否在兩個年度間呈現一致的態勢或者有所變遷？

圖 1(A) 的預測機率圖顯示，參與規範認知的分數越高，積極政治參與的可能性越高，兩個年度的預測機率圖形基本上呈現類似的走勢，雖然截距有不小的差距，即 2014 年時，在其公民規範認知維持相同水準的情況下，民眾積極參與政治的可能性本來就比 2004 年還高。總之，從圖 1(A) 左側圖形看來，不同年度的參與規範認知對於積極政治參與的影響沒有太大的差異，即兩個線圖的斜率頗為接近。至於義務規範認知與積極政治參與的關係，圖 1(A) 右側圖形則顯示，雖然 2004 年的線圖和 2014 年的相比，較有上昇的趨勢，但整體來說，和左側圖相較，兩個年度的線圖都相對較平，因此義務規範認知對於積極政治參與的實質影響非常有限。

在投票參與方面，圖 1(B) 右側顯示，義務規範認知的分數越高，則投票參與的可能性越高。不過，從預測機率圖中我們發現，義務規範認知與投票參與的預測機率在兩個年度之間有些許不同——201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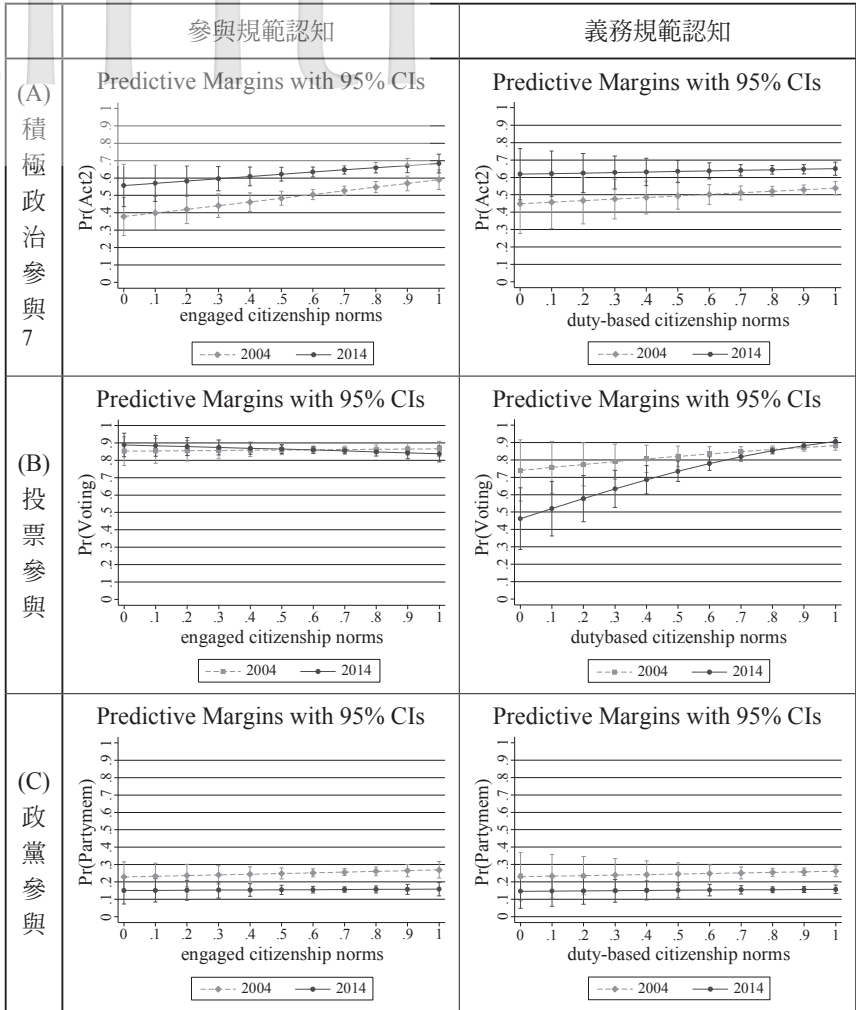


圖 1 不同年度公民規範認知對於政治參與預測機率的差異

資料來源：章英華、傅仰止（2005）、傅仰止等（2015）。

7 為了計算及用較簡潔的方式呈現結果，我們將積極政治參與重新編碼，由有序多分轉為二元變數，即有參與的為 1，沒有參與的為 0。

的線圖看起來較陡些，但實際上兩者的差異（即交叉項的係數）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在政黨參與方面，圖 1(C) 的兩張圖顯示，兩種規範認知幾乎不影響政黨參與的預測機率。不論是 2004 年或 2014 年，線圖的走向都是平的。換言之，民眾不論哪一項公民規範認知的分數增加，都不會影響其政黨參與的預測機率。雖然兩張圖中兩條線圖的截距有所差別，即 2004 年具有黨員身分者的可能性原本就較 2014 年高一些。總之，透過檢視公民規範認知對於政治參與的實質影響，我們發現兩者的關係在十年之間有很高的一致性，改變的幅度有限。

四、因素與機制的變遷——反事實分析

藉由上一節的資料分析，我們確認了兩個年度中，兩種公民規範認知與三種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綜合來說，參與規範認知影響民眾的積極政治參與，義務規範認知影響民眾的投票參與，而兩種規範認知都不影響民眾加入政黨的意願。換言之，公民規範認知至少會影響兩種類型的政治參與，即個人的信念與價值的確會影響其政治行為，驗證了文化途徑的觀點。

不過，這樣的發現並非全然推翻其他解釋政治行為的途徑。上述分析結果也顯示，不論是社會結構途徑（即個人人口變數）或是心理態度途徑（即政治態度），同樣也能用來解釋民眾的政治參與。因此，同時以這三個途徑來分析政治行為並不衝突；且本研究發現，不同途徑所衍生的變數在不同的狀況下，對於政治參與有不同的影響力。

本文另一個關注的焦點，就是台灣從民主轉型期到民主鞏固期，影響民眾政治參與的因素及機制是否有所轉變？前述文獻強調：社會及政治現代化進程會造成個人價值觀與態度的轉變，進而影響政治參

與。然而，我們並不確定，當參與行為隨著民主化進程轉變時，主要是取決於民眾價值或態度本身（即影響因素）的轉變，還是影響因素與行為之間的連結（即影響機制）轉變了？比方說，表 3 顯示從 2004 年到 2014 年，民眾積極性政治參與增加了，則該增加究竟是因為如公民規範認知、人口特徵、或政治態度等會影響政治參與變數的數值改變了，還是上述這些變數與積極政治參與之間的關聯性改變了？

爲了瞭解這種跨時差異，我們透過反事實分析法，來探討 2004 年到 2014 年的變遷。具體而言，我們將不同年度的調查資料（譬如 2004 年），帶入另一年度（譬如 2014 年）的統計模型，藉以觀察不同年度資料所得出的預測機率值差異，並計算這樣的差異是來自於自變數本身的變異？還是依變數與自變數之間連結關係增強或減弱？這項分析包括三個步驟：首先，我們將三種不同的政治參與，都設定爲勝算對數模型，於是兩個年度的預測參與機率模型可分別以方程式（1）及方程式（2），表示如下：⁸

2014 年預測參與機率模型

$$\Pr(y_{14}=1|x)=\exp[\alpha_{14}+\beta_{14}Citizenship_{14}+\mathbf{x}_i\boldsymbol{\beta}+\boldsymbol{\varepsilon}]\times[1-\Pr(y_{14}=1|x)] \quad (1)$$

2004 年預測參與機率模型

$$\Pr(y_{04}=1|x)=\exp[\alpha_{04}+\beta_{04}Citizenship_{04}+\mathbf{x}_i\boldsymbol{\beta}+\boldsymbol{\varepsilon}]\times[1-\Pr(y_{04}=1|x)] \quad (2)$$

當我們使用原本 2004 年及 2014 年的資料及模型去預測參與機率時，如同表 7 欄（A）及欄（C）所示，2004 年積極政治參與的預測機率平均值是 0.519、投票參與的預測機率平均值是 0.865、加入政黨

8 爲了計算及用較簡潔的方式呈現結果，我們將積極政治參與重新編碼，由有序多分轉爲二元變數，即有參與的爲 1，沒有參與的爲 0。

的預測機率平均值則為 0.240。相對地，2014 年三者的預測機率平均值則分別為 0.650、0.824、及 0.167。顯然，兩個年度的三種參與機率都不同，於是下一步，我們即透過反事實的推論，來解析這些依變數跨年的差異，究竟有多大程度取決於自變數（即影響因素）的值在不同年度、跨時的變化？又有多大程度取決於兩個年度模型的係數（即影響機制）差異？

假設我們把 2004 年的民眾，原封不動、完整地搬到 2014 年，即維持所有 2004 年觀察值之自變數的值（包括公民規範認知、人口特徵及政治態度等），並觀察這群人到了 2014 年的環境脈絡當中，各項政治參與的預測機率和原本在 2004 的環境脈絡下有多大的不同？換言之，我們先利用 2014 年預測模型（透過方程式（1））所設定好的自變數與依變數的關聯性，即 2014 年的模型係數，再帶入 2004 年的資料進行反事實的推論，得出 2004 年的民眾若換到了 2014 年時，其公民規範認知影響政治參與的預測機率。作法如同下列方程式（3），結果則如表 7 欄（B）所示。

將 2004 年的資料帶入 2014 年設定的模型當中，即：

$$\Pr(y_{\text{predicted}}=1|x)=\alpha_{14}+\beta_{14}\text{Citizenship}_{04}+\beta_{14}X_{04}+\varepsilon \quad (3)$$

最後，我們將原本 2014 年模型（方程式（1））的預測機率、2004 年模型（方程式（2））的預測機率，及使用 2014 年模型係數但代入 2004 年資料的反事實分析模型（方程式（3））之預測機率等三項預測值，匯整比較，藉以解釋從 2004 年到 2014 年，個人認知或態度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是如何轉變的？

表 7 總結了三項政治參與的反事實分析預測機率，其中計算的說明如下：首先，我們先比較欄（A）與欄（C），得出 2004 年與 2014

表 7 反事實分析預測機率模型

| | 2004 預測機率 (A) | 04 資料 帶入 14 模型 (B) | 2014 預測機率 (C) | 變化 (D) | 歸因給變數 [(C)-(B)]/(D) | 歸因給係數 [(B)-(A)]/(D) |
|--------|---------------------|--------------------------|---------------------|-----------|------------------------|------------------------|
| 積極政治參與 | 0.519 | 0.633 | 0.650 | 0.131 | 0.017 12.98% | 0.114 87.02% |
| 投票 | 0.865 | 0.856 | 0.824 | -0.041 | -0.032 78.05% | -0.009 21.95% |
| 黨員身份 | 0.240 | 0.142 | 0.167 | -0.073 | 0.025 -34.25% | -0.098 134.25% |

資料來源：章英華、傅仰止（2005）、傅仰止等（2015）。

年的預測機率變化值欄（D）（以欄（C）減去欄（A））。其次，我們將 2004 年的資料帶入 2014 年的模型當中，得出反事實預測機率為欄（B）。換言之，欄（C）與欄（B）的異同點為：模型係數相同（都使用 2014 年的模型（方程式 1）），但使用的資料不同。於是，若以欄（C）減去欄（B），所得出的結果為資料變異所造成的差異，不是模型（係數）所造成的差異；相對地，若以欄（B）減去欄（A），所得出的結果則為模型（係數）所造成的差異，而非資料變異所造成的差異。最後，我們將這兩個值分別除以兩個年度的預測機率變化值（欄（D）），即可從資料的角度（即變數本身）及模型的角度（即模型係數），解析 2004 年到 2014 年之間總變異應如何歸因。

針對積極政治參與的部份，表 7 顯示，2004 年到 2014 年的總變異僅有 13.0% 能夠歸因給變數（即影響因素）的差異，另外 87.0% 則歸因給模型係數（即影響機制）。換言之，從 2004 年到 2014 年，民眾的認知與態度並無太大的變化，但這些變數與積極政治參與之間的

連結變得更強，並導致積極政治參與的可能性增加。至於投票參與，2014年的預測機率較2004年的預測機率還低，使得欄(D)為負值，這樣的發現也符合之前表3所顯示的：即這十年以來，民眾前去投票的比例下降了。而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認知與態度變數的轉變（即78%歸因給變數值），而非影響機制的轉變（即僅22%歸因給係數）。譬如表2所示，從2004年到2014年，民眾的義務規範認知下降了，其中也包括投票參與的重要性降低（如表1所示）。我們可以假設：這種認知的轉變，是解釋這十年來，民眾為何較不去投票的主要因素。至於認知與行為之間的連結，或許同樣在這十年間因環境變遷而減弱了，不過這不是解釋投票參與下降的主要因素。

最後在政黨參與方面（即黨員身分），由於2014年的參與程度遠較2004年來得低，差了6.94%（如表3所示），因此表7中兩個年度的預測機率值差距也是負數，符合預期。但是把2004年的資料帶入2014年的模型當中，所得到的結果比2014年的預測機率還低。換言之，如果我們單純考慮個人認知與態度等影響因素在這十年間的變化時，我們應該看到2014年比2004年的政黨參與還要多（高出0.025），⁹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這十年來政黨參與的預測機率是大幅下降的（下降0.073）。因此，我們在計算表7時，才會得出「歸因給變數」的比例為負值，而「歸因給係數」的比例為正值且超過百分之百。總之，十年間民眾參與政黨的比例之所以下降，完全歸因於影響機制的變遷，畢竟影響因素本身的變化反而應該會導致政黨參與比例增加。

9 譬如，2014年民眾整體的教育程度較2004年提高很多，而根據表6，教育程度與政黨參與高度正相關。因此若單純從個人特徵的層面來看，政黨參與的比例在2014年時應該要比2004年來得高才是（有關變數的描述統計請見附錄3）。

airiti

五、結論

爲什麼民主國家當中，民眾會願意參與政治？這個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行爲研究的核心議題。本研究旨在透過調查資料，從民眾公民規範認知的角度，探討「公民規範—政治行爲」之間的連結。依照 Dalton 的理論，我們首先將民眾的公民規範歸類爲兩個面向：參與規範認知以及義務規範認知，前者包括了積極參與社團組織、瞭解社會上其他多元的意見、以政治或道德的理由決定消費行爲，及幫助國內或世界上生活比較差的人等較偏向法制規範以外的概念；後者則包括了選舉都去投票、從不逃漏稅、遵守法律與規定，及隨時注意政府的施政作爲等較偏向法制規範以內的概念。其次，針對三種不同的政治參與：積極性（或非慣常性）政治參與、投票參與，及政黨參與，我們利用統計模型分別探討兩種規範與三種參與之間的連結程度，並在模型中控制相關的人口變數及政治態度。實證結果顯示：參與規範認知越強的民眾，越會積極地參與非慣常性的政治活動；義務規範認知越強的民眾，越可能會去投票。至於民眾加入政黨的意願，則不會受到這兩種規範認知的影響。

確立公民規範與政治參與的連結之後，我們進一步觀察：民眾政治參與在 2004 年到 2014 年之間是否出現本質上的差異？具體來說，本研究透過反事實分析的方式，從影響民眾政治參與的因素出發，探討十年間的政治參與行爲的改變究竟應該歸諸於影響因素的「量變」，還是源於影響機制的「質變」？首先我們發現，在積極政治參與方面，影響因素的本質並無太大的變化，意即積極政治參與的變化，只有少數變量歸因給公民規範認知、人口特徵、及政治態度等自變數「量」

的改變；而十年來積極政治參與預測機率增加的主因，其實是因為模型中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的連結變強了，即模型中自變數的係數改變而造成依變數的改變。換言之，十年來影響積極政治參與的機制改變了，使得民眾積極政治參與的比例增加了。

其次，有關投票參與的部分，我們發現行為的變量有接近 80% 的比例歸因給自變數本身量的變化。換言之，影響因素的「量變」是造成投票參與下降的主因，而非源於影響機制；最後，在政黨參與方面，十年間的改變可以完全歸因給模型的係數。我們的分析發現，自變數本身量的改變應該會造成政黨參與增加，因此當我們觀察到政黨參與機率下降時，完全是因為模型係數的改變，即影響機制在十年間產生變化所造成的。

總之，比較 2004 年及 2014 年的調查資料顯示，台灣從民主轉型期進入到民主鞏固期後，政治參與的方式已有所轉變，包括積極性政治參與增加及傳統投票參與下降。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轉變反映了一個社會從現代過渡到後現代的特質；從微觀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轉變分別源於主要影響因素的變遷，包括影響機制及影響因素本身的改變。本研究的主要貢獻，即在於提供經驗證據，檢視台灣從民主轉型期至民主鞏固期，公民規範面認知是如何影響民眾的政治參與行為。不過，這項「規範一行為」間的連結還需要更細緻的討論。譬如：Dalton (2008) 就從世代的觀點來分析公民規範的世代差異，並衍生探討不同世代之間政治參與的異同。此外，規範面認知與其他政治態度間（譬如政治效能感或政治興趣等）的關係是否在不同的民主發展期有所轉變？同樣值得我們重新檢視，畢竟規範面、或文化面的認知與政治態度的形塑，有相當緊密的關係，且同時會對政治參與行為有所影響。最後，針對政治參與方面的研究，顯然目前台灣民眾的政治

參與模式已不再侷限於投票行爲，學者即應該更廣泛地探討不同政治參與模式間的差異及其背後的動機。以本文的結果爲例，當參與規範認知與積極政治參與的連結增強後，民眾不只意識到做爲一個「好公民」需要更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還會更進一步訴諸行動，要求擴大公民參與治理模式。這樣的發展趨勢必將衝擊傳統的代議民主制度，即在資訊越透明的民主環境下，民眾將不會一味地處於政府的被動面，或受制於無效率的代議制度，而是要求更多直接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以期符合對於民主治理的理解及想像。也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過去幾年來，各種審議式或參與式民主形態在各個地區紛紛開展（黃東益、施佳良、傅凱若 2007；林國明 2016），不啻反映了更主動積極的公民規範意識與參與行爲間的連結。過去十年來，台灣正從新興民主國家步入成熟民主國家，相關價值、態度，及行爲的變遷都值得我們未來更深入地探討。

附錄一、因素分數與加總分數的相關性

| | 2004 | | | | 2014 | | | |
|--------------|--------------|--------------|--------------|--------------|--------------|--------------|--------------|--------------|
| | 參與規範 因素分數 | 義務規範 因素分數 | 參與規範 加總分數 | 義務規範 加總分數 | 參與規範 因素分數 | 義務規範 因素分數 | 參與規範 加總分數 | 義務規範 加總分數 |
| 參與規範 因素分數 | 1.000 | | | | 1.000 | | | |
| 義務規範 因素分數 | 0.000 | 1.000 | | | 0.000 | 1.000 | | |
| 參與規範 加總分數 | 0.966*** | 0.220 | 1.000 | | 0.957*** | 0.232 | 1.000 | |
| 義務規範 加總分數 | 0.261 | 0.949*** | 0.442 | 1.000 | 0.186 | 0.966*** | 0.380 | 1.000 |

資料來源：章英華、傅仰止 (2005)、傅仰止等 (2015)。

附錄二、變數的測量與處理方式

| 變數名稱 | 2004 年問卷題目 | 2014 年問卷題目 | 處理方式 |
|------------|---|--|---|
| 義務規範 認知 | 15. 選舉都去投票 16. 從不逃漏稅 17. 遵守法律與規定 18. 隨時注意政府的施政作為 | c1a. 選舉都去投票 c1b. 從不逃稅 c1c. 遵守法律與規定 c1d. 隨時注意政府的施政作為 | 將四題的結果由 1 到 7 分的量表加總起來，標準化成為一連續尺度變數。 |
| 參與規範 認知 | 19. 積極參與社會或政治團體 20. 盡量去瞭解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 21. 有些東西就是貴一點，也會為了政治的或倫理（道德）的或環保的考慮去買 22. 幫助國內（台灣）在生活上比您差的人 23. 幫助世界上各地生活比您差的人 | c1e. 積極參與社會或政治團體 c1f. 盡量去瞭解不同意見的人的想法 c1g. 有些東西就是貴一點，也會為了政治的或倫理（道德）的或環保的考慮去買 c1h. 幫助國內（台灣）在生活上比您差的人 c1i. 幫助世界上各地生活比您差的人 | 將五題的結果由 1 到 7 分的量表加總起來，標準化成為一連續尺度變數。 |
| 教育程度 | 9a.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 b1.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 分為四類： 1. 國小及以下，包含：不識字、自修／識字／私塾／小學。 2. 國初中：國（初）中、初職。 3. 高中職：高中普通科、高中職業科、高職、士官學校。 4. 專科：五專、二專、三專、軍警校專修班、軍警校專科班、空中行專／商專。 5. 大學及以上：空中大學、軍警官校或軍警官大學、技術學院，科大、大學、碩士、博士。 |

(續表)

| 變數名稱 | 2004年問卷題目 | 2014年問卷題目 | 處理方式 |
|---------|--|--|--|
| 年齡 | 2.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 a2.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 由於調查年度為103年, 因此以103-受訪者回答年度。 |
| 職業 | 122. 請問您目前(失業前或退休前)主要的職業是什麼? | j4. 請問您現在(以前/退休前)的工作主要的職位和工作內容是? | 依序編碼為 1. 農林漁牧 2. 藍領 3. 中低階白領 4. 中高階白領 5. 其他 |
| 性別 | 1. 性別 | a1. 性別 | 0. 女性 1. 男性。 |
| 外在政治效能感 | 47. 像我這樣的人, 對政府的作用為沒有任何影響 48. 像我這樣的人, 我不認為政府在乎我的想法是什麼 | c8a. 像我這樣的人, 對政府的作用為沒有任何影響 c8b. 您認為政府不在乎您這樣的人的想法是什麼 |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越同意者, 效能感越低, 越不同意者, 效能感越高。 將兩題分數加總, 成爲一連續尺度變數。 |

(續表)

| 變數名稱 | 2004年問卷題目 | 2014年問卷題目 | 處理方式 |
|---------|--|--|---|
| 內在政治效能感 | 49. 對台灣所面臨的一些重大政治問題，我覺得自己還頗為瞭解 50. 我認為台灣大部分的人，都比我更知道政治與政府的事 | c8c. 對台灣所面臨的一些重大政治問題，您覺得自己還頗為瞭解 c8d. 您認為台灣大部分的人，都比您更知道政治與政府的事 |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由於 49 題 (04 年) 與 c8c 題 (14 年) 這兩道題目是採反向敘述，因此回答越同意者代表內在政治效能感越高。因此在這兩題上採反向編碼。 再將兩題分數加總，成為一連續尺度變數。 |
| 政治興趣 | 53. 請問您個人對政治的興趣有多大？ | c10. 請問您個人對政治有沒有興趣？ | 分數越高，興趣越高。 |
| 政黨認同 | 98. 目前國內有幾個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新黨、建國黨，以及台灣團結聯盟，請問您是否偏向哪一個政黨？ 98a. 那相對來說，請問您有沒有稍微偏向哪一個政黨？ 98b. 請問是那一個政黨？ | H5. 國內的政黨都有他們的支持者，請問您是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 H6. 一般而言，請問您會比較偏向哪一個政黨？ | 分為三類： 1. 「泛藍」，包含：國民黨、新黨、親民黨； 2. 「泛綠」，包含：民進黨、台聯； 3. 「中立無反應」。 |

附錄三、模型相關變數描述統計

教育程度

| | 2004 | | 2014 | |
|----------|-------|--------|-------|--------|
| | 次數 | 百分比 | 次數 | 百分比 |
| 1. 國小及以下 | 521 | 29.25 | 361 | 19.28 |
| 2. 國初中 | 246 | 13.81 | 193 | 10.31 |
| 3. 高中職 | 444 | 24.93 | 495 | 26.44 |
| 4. 專科 | 243 | 13.64 | 216 | 11.54 |
| 5. 大學及以上 | 327 | 18.36 | 607 | 32.43 |
| 總計 | 1,781 | 100.00 | 1,872 | 100.00 |

性別

| | 2004 | | 2014 | |
|-------|-------|--------|-------|--------|
| | 次數 | 百分比 | 次數 | 百分比 |
| 0. 女性 | 866 | 48.62 | 941 | 50.19 |
| 1. 男性 | 915 | 51.38 | 934 | 49.81 |
| 總計 | 1,781 | 100.00 | 1,875 | 100.00 |

職業

| | 2004 | | 2014 | |
|----------|-------|--------|-------|--------|
| | 次數 | 百分比 | 次數 | 百分比 |
| 1. 農林漁牧 | 135 | 7.58 | 97 | 5.17 |
| 2. 藍領 | 824 | 46.27 | 1,204 | 64.21 |
| 3. 中低階白領 | 247 | 13.87 | 322 | 17.17 |
| 4. 中高階白領 | 176 | 9.88 | 187 | 9.97 |
| 5. 其他 | 399 | 22.40 | 65 | 3.47 |
| 總計 | 1,781 | 100.00 | 1,875 | 100.00 |

外在政治效能感

| 2004 | | 2014 | |
|------|------|------|------|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 5.69 | 1.88 | 5.44 | 2.19 |

內在政治效能感

| 2004 | | 2014 | |
|------|------|------|------|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 6.14 | 1.45 | 6.07 | 1.68 |

政治興趣

| 2004 | | 2014 | |
|------|------|------|------|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 1.86 | 0.84 | 1.76 | 0.82 |

政黨認同

| | 2004 | | 2014 | |
|-------|-------|--------|-------|--------|
| | 次數 | 百分比 | 次數 | 百分比 |
| 1. 泛藍 | 410 | 23.02 | 434 | 23.27 |
| 2. 泛綠 | 547 | 30.71 | 352 | 18.87 |
| 3. 中立 | 824 | 46.27 | 1,079 | 57.86 |
| 總計 | 1,781 | 100.00 | 1,865 | 100.00 |

參考文獻

- 林國明, 2016, 〈誰來審議? 台灣民眾對審議民主的支持程度和參與意願〉。《台灣社會學》31: 43-97。
- 徐火炎, 2005, 〈認知動員、文化動員與台灣 2004 年總統大選的選民投票行為——選舉動員類型的初步探討〉。《臺灣民主季刊》2(4): 31-66。
- , 2006, 〈台灣的公民權: 經驗內涵的初探〉。論文發表於「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八次研討會」, 台北, 中央研究院, 2006 年 5 月 26 日。
- 崔曉倩、吳重禮, 2011, 〈年齡與選舉參與: 2008 年總統選舉的實證分析〉。《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26: 7-44。
- 章英華、傅仰止, 2005,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04 第四期第五次: 公民權組 (C00112_1)【原始數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 10.6141/TW-SRDA-C00112_1-1。
- 陳建良、曹添旺, 2012, 〈所得分配與社會正義: 台灣個人工資所得不均度分析〉。論文發表於「公民意識、社會正義與公民參與學術研討會」, 台北, 中央研究院, 2012 年 6 月 26-27 日。
- 陳陸輝、耿曙, 2008, 〈政治效能感與政黨認同對選民投票抉擇的影響——以 2002 年北高市長選舉為例〉。《臺灣民主季刊》5(1): 87-118。
- 傅仰止、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 2015,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14 第六期第五次: 公民權組 (C00310_1)【原始數據】。取自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doi: 10.6141/TW-SRDA-C00310_1-1
- 黃秀端, 1995, 〈1994 年省市長選舉選民參與競選活動之分析〉。《選舉研究》2(1): 51-76。
- 黃東益、施佳良、傅凱若, 2007, 〈「說道理」的道理——地方公共審議論理過程的探索〉。《公共行政學報》24: 71-102。
- 黃信豪, 2006, 〈政治功效意識的行動效果 (1998-2003)〉。《臺灣民主季刊》3(2): 119-158。
- 黃紀, 2008, 〈因果推論與觀察研究: 「反事實模型」之思考〉。《社會科學論叢》2(1): 2-22。
- 楊婉瑩, 2007, 〈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選舉研究》14(2): 53-94。
- 關秉寅、李敦義, 2008, 〈補習數學有用嗎? 一個「反事實」的分析〉。《臺灣社會學刊》41: 97-148。
- Anderson, Jørgen Goul, and Jens Hoff, 2001, *Democracy and Citizenship in Scandinav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Armington, Klaus, 200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Associational Involvement." Pp. 358-383 in *Citizenship and Involvement in European Democra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edited by Jan W. van Deth, José Ramón Montero, and Anders Westholm. London: Routledge.
- Barnes, Samuel Henry, and Max Willy Kaase, 1979,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ennett, Linda L.M., and Stephen Earl Bennett, 1990, *Living with Leviathan: Americans Coming to Terms with Big Governmen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Blais, André, Robert Young, and Miriam Lapp, 2000,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n Empirical Tes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7(2): 181-201.
- Bolzendahl, Catherine, and Hilde Coffé, 2009, "Citizenship beyond Politics: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Civil and Social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mong Women and M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0(4): 763-791.
- , 2013, "Are 'Good' Citizens 'Good' Participants? Testing Citizenship Norm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cross 25 Nations." *Political Studies* 61(S1): 45-65.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 Dahl, Robert A.,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C. 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lton, Russell J., 2008, "Citizenship Norms and the Expans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Studies* 56 (1): 76-98.
- , 2009, *The Good Citizen: How a Younger Generation is Reshaping American Politics*, revised edition.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DeNardo, James, 1980, "Turnout and the Vote: The Joke's on the Democra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2): 406-420.
- Hechter, Michael, and Karl-Dieter Opp, 2001, "Introduction," Pp. xi-xx in *Social Norms*, edited by Michael Hechter, and Karl-Dieter Opp.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Horne, Christine, 2003, "The Internal Enforcement of Norm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 335-343.
- Howard, Marc Morjé, 2002, "The Weakness of Postcommunist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Democracy* 13(1): 157-169.
- Hutcheson, Derek S., and Elena A. Korosteleva, 2006, "Patterns of Participation in Post-Soviet Politics."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4(1): 23-46.
- Inglehart, Ronald, 1990,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2008, “Changing Valu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from 1970 to 2006.” *West European Politics* 31(1-2): 130-146.
- Inglehart, Ronald, and Wayne E. Baker,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1): 19-51.
- Janoski, Thomas, 1998, *Citizenship and Civil Society: A Framework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Liberal, Traditional, and Social Democratic Reg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sso, Guillermina, and Karl-Dieter Opp, 1997, “Probing the Character of Norms: A Factorial Survey Analysis of the Norms of Political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6): 947-964.
- Knack, Stephen, 1992, “Civic Norms, Social Sanctions, and Voter Turnout.”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4(2): 133-156.
- , 1994, “Does Rain Help the Republicans? Theory and Evidence on Turnout and the Vote.” *Public Choice* 79(1-2):187-209.
- Leighley, Jan E., 1995, “Attitudes, Opportunities and Incentives: A Field Essay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8(1): 181-209.
- Liefbroer, Aart C., and Francesco C. Billari, 2010, “Bringing Norms Back In: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Discussion of Their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Demographic Behaviour.”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6(4): 287-305.
- Lijphart, Arend, 1997, “Unequal Participation: Democracy’s Unresolved Dilemm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1): 1-14.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96,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 Edged Swor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Lister, Ruth, 2003, *Citizenship: Feminist Perspectiv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achado, José A.F., and José Mata, 2005, “Counterfactual Decomposition of Changes in Wage Distributions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4): 445-465.
- Marshall, Thomas H., 1950,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Irene. and Jan. W. van Deth, 2007, “Political Involvement.” Pp. 303-333 in *Citizenship and Involvement in European Democra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edited by Jan W. van Deth, José Ramón Montero, and Anders Westhol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arquart-Pyatt, Sandra, and Pamela Paxton, 2007, “In Principle and In Practice: Learning Political Tolerance i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Political Behavior* 29(1): 89-113.

- Mishler, William, and Richard Rose, 2002, "Learning and Re-learning Regime Support: The Dynamics of Post-communist Reg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1(1): 5-36.
- Muller, Edward N., 1982, "An Explanatory Model for Differing Types of Particip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0(1): 1-16.
- Nevitte, Neil, 1996, *The Decline of Deference: Canadian Value Change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Norris, Pippa, 2002, *Democratic Phoenix: Reinventing Politic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pp, Karl-Dieter, 1986, "Soft Incentiv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1): 87-112.
- , 1994, "Repression and Revolutionary Action: East Germany in 1989."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1): 101-138.
- Opp, Karl-Dieter, Käte Burow-Auffarth and Uwe Heinrichs, 1981, "Conditions for 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Hypothes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9(2): 147-168.
- Pattie, Charles, Patrick Seyd, and Paul Whiteley, 2003, "Citizenship and Civic Engagement: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in Britain." *Political Studies* 51(3): 443-468.
- Peffley, Mark, and Robert Rohrschneider, 2003, "Democratization and Political Tolerance in Seventeen Countries: A Multi-level Model of Democratic Learning."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6 (3): 243-257.
- Raney, Tracey, and Loleen Berdahl, 2009, "Birds of a Feather? Citizenship Norms,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Wester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1): 187-209.
- Riker, William H., and Peter C. Ordeshook, 1968, "A Theory of the Calculus of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1): 25-42.
- Rossi, Peter H., and Richard A. Berk, 1985, "Varieties of Normative Consens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3): 33-47.
- Sandel, Michael J., 1998,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arrow, Susan E., and Burcu Gezgor, 2010, "Declining Memberships, Changing Members? European Political Party Members in a New Era." *Party Politics* 16(6): 823-843.
- Schwartz, Shalom H., and Anat Bardi, 1997, "Influences of Adaptation to Communist Rule

- on Value Priorities in Eastern Europe.” *Political Psychology* 18(2): 385-410.
- Stolle, Dietlind, Marc Hooghe, and Michele Micheletti, 2005, “Politics in the Supermarket: Political Consumerism as a Form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6(3): 245-269.
- Theiss-Morse, Elizabeth, 1993, “Conceptualizations of Good 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15(4): 355-380.
- Tsai, Chia-hung, 2001, “Why Do Taiwanese Vote?” *Journal of Election Studies* 8(2): 125-168.
- Van Deth, Jan W., 2007, “Norms of Citizenship,” Pp. 402-417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Behaviour*, edited by Russell. J. Dalto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erba, Sidney, 1996, “The Citizen as Respondent: Sample Survey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9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1): 1-7.
- Verba, Sidney, and Norman H. Nie,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Verba, Sidney, Kay. L.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ukin, Cliff, Scott Keeter, Molly Andolina, Krista Jenkins, and Michael X. Delli Carpini, 2006, *A New Engagemen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ivic Life, and the Changing American Citiz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